

# 河图、河患与河臣

——台北故宫藏于成龙《江南黄河图》与康熙中期河政

席会东

(西北大学西北历史研究所, 陕西西安, 710069)

[提要] 河图在清代尤其是康熙朝的河患治理和河政运作中具有重要作用。台北故宫博物院所藏《江南黄河图》是由康熙帝亲自授命、由河道总督于成龙在清康熙三十八年(1699年)绘制而成的。为解决河臣董安国误筑拦黄坝所引发的黄河河患,康熙帝于康熙三十八年三月第三次南巡阅河,并授命河臣于成龙、内务府官员董殿邦等人绘制黄河图,其后他还亲自创制立体“清口图”,这几幅类型多样的河图都在康熙中期的河政运作中得到了充分运用。于成龙绘呈的《江南黄河图》曾经康熙帝与大学士等朝臣研读讨论,是河道总督于成龙和康熙帝之间、康熙帝和大学士之间、大学士和九卿、詹事、科道之间沟通河务的桥梁,以及清廷进行河政决策的重要依据。此图表现了康熙中期河政党争、康熙帝南巡、于成龙治河等重大历史事件,反映了康熙中期的舆图绘制机制和河政运作,在清代河政史、水利史和地图史上都具有重要地位。

[关键词] 《江南黄河图》 河政 康熙帝 于成龙 董殿邦

[中图分类号] K928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1-5205(2013)04-0130-09

[收稿日期] 2013-01-11

[基金项目] 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清代黄河图研究”(批准号:12CZS076),教育部人文社科基金项目“水情水志与水法:清代洪涝灾害预警机制研究”(批准号:13YJC770064)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 席会东(1981—),男,河南巩义人,西北大学西北历史研究所讲师,历史学博士,主要从事地图史、城市史、中欧交流史研究。

所谓“河图”,就是描绘河道及其水利工程的舆图。传统中国以农业立国,以“治水国家”和“水利社会”而闻名于世,与之相关的河图源远流长。迨至清代,河图的绘制与运用更趋成熟化、多样化与制度化。治黄事关清朝漕运畅通与京师国库供给、沿黄数省财赋民生与社会稳定,是清朝国计与民生之所系,与之相应的河工是维系黄河安流、漕运畅通的国家重要工程,河政是清代历朝政府重要的施政内容,相应的黄河图是清代河图的主体,绘制运用黄河图是清代皇帝、朝臣、内臣与河臣沟通河务、治理河患、处理河政、修治河工的重要手段和依据。

就整个清代来看,康熙朝是黄河图绘制和运用最为普遍的时期,该时期不少黄河图都是在康

熙帝的授意下绘制的,这与康熙帝本人重视治河、六次南巡阅河、亲自参与治河密切相关。康熙帝“听政以来,以三藩及河务、漕运为三大事,夙夜靡念,曾书而悬之宫中柱上”<sup>①</sup>。康熙二十年后,三藩已平,而黄河泛滥、运河淤塞,

<sup>①</sup>《清圣祖实录》卷154“康熙三十一年二月辛巳”条,《清实录》第6册,(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701页。关于康熙治河的研究,主要有李鸿彬:《康熙治河》,《人民黄河》1980年第6期,第55—59页;刘德仁:《论康熙的治河功绩》,《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1981年第2期,第57—62、93页;商鸿逵:《康熙南巡与治理黄河》,《北京大学学报》1981年第4期,第42—51页;李国梁:《康熙治河》,《史学月刊》1983年第3期,第92—93页。

治河保运成为康熙帝最关注的军国要务。为治理黄河河患，康熙帝一方面任命靳辅、张鹏翮等能臣总督河道，并不时派朝臣或内臣巡视河工；一方面一再谕令河臣进呈河图，在宫中时时研读河图与治河之书，亲自探究治河之道，并经常与大学士、九卿等朝臣阅图议事、筹议良方。除了委派能臣治河、朝臣巡河、研读河图之外，康熙帝还六次南巡，亲临河工，了解河情，指授方略。而南巡之时，康熙帝往往携河图前往，在河工现场，和随行大臣一道展图阅览，与河工实情相互勘验，评点河臣的功过得失，制定方略。在康熙朝的文献之中，治河是康熙中晚期最重要的内容之一，而关于河图的记载也屡见不鲜。可以说，康熙朝治河之所以取得重大成就，与康熙帝重视河图的绘制和运用是分不开的。

本文首先通过综合分析图上内容与形式及相关文献，考订台北故宫博物院所藏《江南黄河图》的绘制年代与源流，再根据清代河工图的绘制机制，分析判定《江南黄河图》的绘制者与绘制背景，厘清康熙朝中期河督董安国、于成龙治河史实，梳理康熙朝中期康熙帝、河臣、朝臣绘制运用河图、进行河政决策的机制与过程。在此基础上，本文最后归纳台北故宫博物院所藏《江南黄河图》在康熙中期河工修治、河政运作中的作用及其在清代河政史与清代河渠水利图历史中的价值与影响。

## 一 台北故宫藏《江南黄河图》之源流与内容

台北故宫博物院图书文献处藏有《江南黄河图》长卷一幅<sup>①</sup>，档案号为021501，绢本彩绘，纵横146×328厘米，未注撰者和绘制年代。王庸1932年编订《国立北平图书馆特藏清内阁大库舆图目录》著录此图为：江苏南河图，一轴，青绿画，绢本，青绫边，破。此系黄淮合流时黄河下游及其附近堤防之图。东自海岸河口起，西至江苏西北边碭山县止，故称“江苏南河图”<sup>②</sup>。据此可以断定，此图为原清内阁大库之图。1986年编订《“国立中央图书馆”善本书目》将此图著录为“明代绢本彩绘”<sup>③</sup>。今览图上的行政建置和水利工程均系清代情形，绝非明代舆图。根据清代舆图命名规则和通例，此图应命名为“江

南黄河图”<sup>④</sup>。

《江南黄河图》以水平方向自右向左展开，将淮河、黄河、运河从上到下并置于一图之中。全图将黄河的右岸（即南岸）画在图的上方（方位大致为上南下北，左东右西），以传统形象画法描绘单县、沛县、碭山县至海口段黄河，独山湖至长江段运河，颍州至洪泽湖段淮河等三河的河势及堤防工程。图中重点描绘了清口（黄运交会处）至海口段的黄河堤防，清口至长江、运河交会段的里运河，以及高邮、宝应等七州县所在的下河地区，加粗线条绘制上述区段的堤防。图

<sup>①</sup>北京大学李孝聪先生提供从台北故宫博物院带回的黑白缩印复制件，特致谢忱。

<sup>②</sup>王庸：《国立北平图书馆特藏清内阁大库舆图目录·附国立北平图书馆特藏新购舆图目录》，（北平）国立北平图书馆，民国二十一年（1932年），第3页。

<sup>③</sup>台北“国立中央图书馆”编：《“国立中央图书馆”善本书目》，（台北）“国立中央图书馆”，1986年，第342页。

<sup>④</sup>“南河”是“江南黄河”的简称，其中已含有“江南省”的涵意，不宜再赘用“江苏”。江南分省时间，史料记载纷乱，学者意见多有不同，主要有康熙六年说、乾隆二十五年说、乾嘉之际说等观点，笔者赞同乾嘉之际说，将有专文论述。从清代地图和河政、漕政等文献中的实际情形来看，江南分为江苏、安徽两省是一个复杂而漫长的历史过程。康熙五十七年的《皇舆全览图》、雍正七年的《皇舆十排全图》、《十五省小总图》和乾隆二十六年的《乾隆十三排图》等清廷三大官方实测地图中，都只有江南省而无江苏、安徽省；甚至清后期还经常见到江南省的称谓和以江南省为绘制单位的地图。就河图而言，无论是清代雍正年间的《天下舆图总折》、乾隆二十六年的《萝图荟萃》、乾隆六十年的《萝图荟萃续编》等图目，还是清代档案、奏疏、水利专著中，都只有“江南黄河图”或“南河图”之称，而没有“江苏黄河图”之称。关于江南分省问题的研究，参见侯杨方：《清代十八省的形成》，《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10年第3辑，第17—28页；姜涛：《清代江南省分治问题——立足于〈清实录〉的考察》，《清史研究》2009年第2期，第12—22页；傅林祥：《清代江苏建省问题新探》，《清史研究》2009年第2期，第23—31页；傅林祥：《江南、湖广、陕西分省过程与清初省制的变化》，《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8年第2辑，第118—126页；公一兵：《江南分省考议》，《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2年第1辑，第75—84页；王社教：《安徽称省时间与建省标志》，《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1年第1辑，第167—177页；季士家：《江南分省考实》，《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0年第2辑，第99—117页；等文。

中山脉的绘制较为简单，河、湖、海均绘出水波纹，其中长江鱼鳞状波纹的画法较为精细，而海洋波纹和浪花的描绘尤其生动形象，使黄海显得波澜壮阔、气象万千。

通过对图上内容尤其是水利工程的考释与解读，可以准确判断出《江南黄河图》的绘制年代。首先，从政区建置来看，江苏山阳县庙湾镇尚未设置阜宁县，说明此图表现内容在雍正九年（1731年）八月之前；“仪真”未改名“仪征”，也即没有避清世宗雍正帝胤禛的名讳，表明此图的绘制年代在雍正元年（1723年）以前。其次，从图上绘制的水利工程来看，清康熙年间修筑的水利工程在图上大量出现，表明此图不可能是明代舆图或顺治年间的舆图。图中桃源、清河、安东段黄河北岸的中河已经绘出，漕船出清口渡黄河、从仲家庄双闸入中运河，表明此图的绘制年代在康熙二十六年（1687年）靳辅开凿中河之后；清河县连通黄河与盐河的双金门闸已经建立，表明其表现年代在康熙三十四年（1695年）之后；云梯关以东绘出拦黄坝，黄河从云梯关外的马家港东注黄海，表明其绘制年代在康熙三十五年（1696年）董安国修筑拦黄坝之后；图上新中河尚未开凿，说明其表现内容在康熙三十八年（1699年）于成龙开凿新中河之前<sup>①</sup>；图中黄河尾间段的拦黄坝完好无损，说明其表现内容在康熙三十八年（1699年）于成龙奉康熙帝之命拆除部分拦黄坝和康熙三十九年（1700年）张鹏翮拆除全部拦黄坝、康熙钦赐“大通口”之前。再次，从绘图的风格来看，《黄河图》采用了鸟瞰画法，是清初和康熙年间河图的典型绘制技法和风格，也可以表明此图绘制于清雍正朝之前。另外，此图中清口附近水利工程形态的画法，与康熙二十六年前后周洽绘制、靳辅进呈、现同藏台北故宫博物院的《黄河图》<sup>②</sup>较为类似，表明两图的绘制年代相去不远。

综合来看，《江南黄河图》的绘制时间应该在康熙三十五年（1696年）至康熙三十八年（1699年）之间。从绘制机制来看，清代黄河图主要是由河道总督组织编绘的；而在这段时间担任河道总督的有董安国和于成龙两人，通过对两人生平事迹尤其是担任河督时所修工程的考订，就可以判定此图反映的是哪任河督的治河事迹，

进而厘清此图的绘制者和绘制背景。

## 二 于成龙治河、康熙南巡 与《江南黄河图》之绘制

康熙中期，靳辅治河之后，黄运两河基本得以安流畅通，但其下河治理之策因康熙帝的疑虑和其他大臣的反对没有实施，下河地区的河患没有得到根本解决<sup>③</sup>。继任的河督王新命无所作为，而董安国则更是误筑拦黄坝，致使黄淮从海口向上游连年溃决，下河地方时遭淹没，清口淤塞<sup>④</sup>。清廷虽不惜每年花费数百万库银，屡遣大臣督修，但因河臣措施不当，均无成效。

康熙三十四年（1695年）八月己酉至康熙三十七年（1698年）十一月丁酉间，董安国担任河道总督。康熙三十五年（1696年）黄河在董家营决口，水入射阳湖，苏北里河、下河地区几成泽国，高宝等七州县哀鸿遍野。董安国认为是黄河尾间、海口段河道淤浅所致，遂命人在云梯关外筑起一道长六百余丈的挡水月堤，称“拦黄坝”，并在四套处的马家港开挖引河一千三百余

<sup>①</sup>[清]张鹏翮《治河全书》卷5《中河图说》详细记载了中河和新中河的来历，其文略云：“向者漕艘自清口出黄河，溯流而上，至支河口入运河。康熙二十六年（1687年），前河臣靳辅以黄河风涛之险，请自骆马湖凿渠，历宿、桃二邑，至清河仲家庄出口，名曰中河，以通行运。康熙三十八年（1699年），前河臣于成龙因桃清中河南岸逼近黄河，地势卑下，滞水弥漫，难以筑堤，乃自桃源盛家道口至清河，弃中河下段，改凿六十里，名曰“新中河”。及次年（1700年），臣鹏翮任事，见新中河浅狭，未足行运，且盛家道口河头湾曲，重艘挽运不顺。仰遵圣谕，于三义坝以下，用新中河之半，三义坝以上，用旧中河之半，合为一河，重加挑浚，一律深通，于是运道始成，而漕艘利涉矣。”载《续修四库全书》第847册，影印天津图书馆藏清康熙四十二年抄绘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第411页。

<sup>②</sup>席会东：《清康熙绘本〈黄河图〉研究及相关史实考述》，《故宫博物院院刊》2009年第5期，第104—126页。

<sup>③</sup>关于康熙中期治河党争、靳辅治河，详参席会东：《清康熙绘本〈黄河图〉研究及相关史实考述》，第113—117页。另参王英华：《康乾时期关于治理下河地区的两次争论》，《清史研究》2002年第4期，第76—85页。

<sup>④</sup>关于董安国治河及其所绘的黄河图，参见席会东：《海外藏康熙〈黄运两河全图〉研究》，《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2013年第10期，第79—88页。

丈，引黄河主流从云梯关外马家港由南潮河东注入海<sup>①</sup>，形成新的尾间河道。因新开尾间河道狭窄曲折，黄河下游泄水不畅，上流愈益壅遏，引发上游频繁溃决，致使清口淤垫，洪泽湖水泛滥，泄入下河高宝七州县。康熙三十八年三月，康熙帝南巡高家堰时，指示时任河道总督于成龙拆除拦黄坝，但于成龙并未拆除全部拦黄坝。康熙三十九年（1700），张鹏翮出任总河，他上任之初就巡视黄河入海口，修治尾间河身。在康熙的支持下，他悉数拆除拦黄坝，并开浚黄河尾间近海河身，实施后成效显著，得到康熙的赞赏，并亲自给原拦黄坝处赐名“大通口”<sup>②</sup>。此后黄河顺轨，安澜十余年，董安国遗留的问题得到了彻底解决。

于成龙，字振甲，汉军镶黄旗人，门荫入仕，历任通州知州、安徽按察使、直隶巡抚、安徽巡抚、河道总督，为官清廉，颇有政绩，深得康熙帝信任和欣赏。但他为人刚愎自用，曾拉拢党羽，极力反对前任河督靳辅开凿中河和筑堤束水的下河治理之策，并在康熙二十六、七年间酿成党争，致使靳辅于康熙二十七年被罢职，其幕僚陈潢下狱冤死。康熙三十一年十二月壬午，于成龙受命担任河道总督。康熙三十三年，于成龙上疏奏请加筑通州至峰县间的运河堤防和茌泽至碭山间的黄河堤防，改建高家堰土堤为石工，疏毛城铺引河，筑清江浦迤下及江都、高邮诸堤工。另别疏请设道员以下各官，并请开吏民捐款筑堤。康熙帝准其筑高家堰石工之请，但他开捐例的主张遭到康熙帝当庭责难。在康熙帝的诘问下，他承认靳辅所开减水坝有益，从前诋毁靳辅之言是妄奏。康熙三十四年八月癸卯，于成龙丁父忧去职还京，董安国代任河道总督<sup>③</sup>。康熙三十七年，于成龙以总督衔管直隶巡抚，修筑永清、固安浑河堤，并加以濬治，绘图进呈，康熙帝命改浑河名为永定河。康熙三十七年十一月丁酉，董安国因无能而罢职，于成龙复任河道总督。康熙三十八年，康熙第三次南巡。三月庚午，康熙在清口临视高家堰、归仁堤等工，令于成龙疏浚清口、改建东西坝，使清水畅出、刷深黄河，将黄河尾间河段裁弯取直，拆除云梯关外的拦黄坝，使黄河下游畅流入海，并命他将清口应修之处绘图呈览<sup>④</sup>。其后，康熙帝沿运河一路

南行，用水平尺测量各处水位，指出黄河下游水位过高是导致黄水倒灌、清口淤垫、里运河泛滥、下河水患的原因，责令于成龙坚筑高邮以上临湖堤岸、高邮以下里运河东堤，挑浚疏通芒稻河、人字河，使高邮诸湖水、运河水由其归于长江。按照康熙帝的指示，于成龙拆除部分拦黄坝，并开凿了新中河。但因他年迈多病，康熙帝指示修筑的许多工程并未实施。康熙三十九年二月间，于成龙派人堵塞马家港，工未竟而于康熙三十九年三月病逝。

康熙三十九年三月丁未，康熙帝品评几任河道总督的是非功过时说：“靳辅治河时，河道甚好。自任王新命后，仅守靳辅成绩，并无别行效力之处。于成龙初任总河，已将靳辅所修之处，

<sup>①</sup>[清]张鹏翮：《治河全书》卷15《章奏》“会勘马家港等工”条录董安国于康熙三十五年十月十二日所上“谨陈两河见在情形请旨公勘会议以重河防事”题本记载：“惟海口乃全黄去路，案查云梯关迤下，为昔年海口，今则日淤日垫，距海二百余里。下流之宣泄既迟，则上游之壅积愈甚，水势不能容受。小则倒灌，大则漫溢，断断不免矣。见今河臣于云梯关下马家港地方挑挖引河一千三百余丈，导黄河之水由南潮河东注入海，急应僭挑开放。”载《续修四库全书》第847册，第695页。《治河全书》卷十六《章奏》“海口创建拦黄坝”条中载董安国于康熙三十六年二月所上题本也详细记载了拦黄大坝及筑堤束水工程的修筑情形，载《续修四库全书》第847册，第699页。

<sup>②</sup>[清]张鹏翮：《治河全书》卷11“清河山阳安东三县黄河事宜”条（《续修四库全书》第847册，第588页）中载：“马家港，查此港因康熙三十五年，前河臣董安国以海口淤浅，开挖引河，导黄由小河口以入海。至三十九年二月间，前河臣于成龙委员堵塞，是年四月间合龙。六月间，水冲开复筑未就。今大通口宽深河流顺轨，此港尽淤，四十年置铁犀堤上以镇之。大通口，即旧拦黄坝处。康熙三十八年，议拆拦黄坝。前河臣仅拆其半，至三十九年臣遵旨尽行拆去。即于是年赐名“大通口”。又伦敦英国博物馆藏张鹏翮《运河全图》黄河入海段云梯关外的大通口处的注文《大通口说》也有相似记载。

<sup>③</sup>王钟翰点校：《清史列传》卷8《于成龙传》，（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第4册，第575—582页。

<sup>④</sup>《清圣祖实录》卷192“康熙三十八年三月庚午”条，《清实录》第五册，（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1035页。《圣祖仁皇帝圣训》卷33《治河一》“康熙三十八年三月庚午”条记载相同。

改治一二次。及至董安国，则事尽废坏不堪矣。”<sup>①</sup>他还认为靳辅、董安国、于成龙等人都仅知筑堤，不懂疏浚清口、使清水畅出刷深河身，都没有彻底解决水患。总体来看，于成龙勇于任事，为官清廉，担任直隶巡抚期间治理永定河（即浑河）也确有成效，但他先后两任河道总督期间，除开凿新中河外，并无太多建树，更没有解决董安国误筑拦黄坝而加剧的黄河尾间决口和清口淤垫以及靳辅治河以来的下河水患问题。这也导致康熙帝对他的信任和欣赏演变为质疑和责难。

于成龙两任河道总督期间，曾经绘呈过多幅黄河图。上文已经述及，康熙三十八年三月庚午，康熙南巡临视高家堰、归仁堤时，曾命于成龙将清口应修之处绘图呈览。于成龙进呈的河图都经过康熙帝的御览和批示，也经过清廷重臣的研读和讨论，在清廷讨论下河治理方略时起到一定的作用。张鹏翮《治河全书》卷二《上谕》载：

臣（张鹏翮）到清江浦，询笔帖式马泰，检出御书上谕一条，由清字译出，系康熙三十八年七月初三日上谕，谕河道总督于成龙：“画河图去的董殿邦等于七月初三日到来……再细观河图内，要紧应修两处，今特谕：在南方面谕你将人字、芒稻河紧急挑挖等谕，闻得至今未曾动工；若真未动工，大有所失。似此迟误，不但运河东堤难保，关系民生最重。如今若不紧紧挑宽五、六十丈，使不得为此”。又专谕尔等又一件事：“看得河图内归仁堤、便民闸等口，俱已堵塞，毛城铺以下等口，俱未堵塞。将便民闸等口堵塞，毛城铺等口所出之水将归何处？必定散漫各处，民大受害。此处关系紧要，宜速筹一策。这二事外，各处工程修至何等光景？将水势情形，紧急奏闻，为此特谕。”<sup>②</sup>

据此可知，康熙三十八年七月初三（庚午），康熙帝派人传满文上谕给于成龙，以河图所示情形责令于成龙尽速挑浚人字河、芒稻河，堵塞毛城铺迳下各口。因于成龙系满洲人，故康熙帝以满文传上谕。其后，满文上谕由笔帖式马泰译为汉文后保存于清江浦河督衙署中。据康熙上谕可

知，康熙帝之前曾派董殿邦去清江浦河署问候于成龙，向其了解河务进展，并绘制河图。董殿邦于三十八年七月初三向康熙帝复命时，带回奉命绘制的河图供康熙帝御览。

董殿邦，字涵公，辽海人，归入满洲正黄旗籍，是清代内务府董氏家族的重要代表人物，而且他本人以善画山水画见长<sup>③</sup>，所以康熙帝才委派他前往河院了解河情、绘制河图，责令于成龙绘制河图。董殿邦于康熙三十八七月初三从河院带回、呈送给康熙御览的河图，究竟是董殿邦奉命所绘，还是于成龙所绘，抑或是两人合作绘制，因史料阙如，难以定案。但董殿邦曾传谕督促于成龙治河绘图，并将绘成之河图带回进呈康熙，足见董殿邦与绘制河图关系之密切。

据其墓表记载，董殿邦一生在康熙、雍正、乾隆三朝为官，所以清陈大复所撰墓表中称其为“三朝之硕辅，一代之伟人”。董殿邦先后任正黄旗包衣管领、佐领等职事与内务府总管事务郎中（康熙五十年）、内务府总管、畅春园总管等要职，自康熙十五年袭官至乾隆四年致仕，宦海沉浮六十余年；其任职之久，堪比康熙、乾隆二帝。尤其需要强调的是，董殿邦曾扈从康熙帝南巡，并绘制河图，与河臣讨论治河事宜。其墓表云：“公学识该洽，经济优长，随所服官，皆有建树。当公之扈跸南巡也，奉旨图写全河形势，日与河臣商榷修防蓄泄之要，动中机宜。江淮间

<sup>①</sup>《清圣祖实录》卷198“康熙三十九年三月丁未”条，《清实录》第六册，第13页。

<sup>②</sup>[清]傅洪泽：《行水金鉴》卷139《运河水》引《河防志》录此上谕与张鹏翮所录文字基本相同（（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年，第2003—2004页）。另《清圣祖实录》卷194“康熙三十八年七月庚午”条（《清实录》第五册，第1050页）记载内容与张鹏翮所记基本相同，但文字已经过修饰，失去了满文上谕原文的口语化特点以及部分信息。又《圣祖仁皇帝圣训》卷33《治河一》“康熙三十八年七月庚午”条与实录记载相同。

<sup>③</sup>[清]佚名：《读画辑略》，不分卷，载洪业辑校：《清画传辑佚》，（北平）北平燕京大学图书馆引得编纂处，民国二十三年（1934年）铅印本，第11—12页。

《读画辑略》清乾隆年间人撰著，文为顺康雍乾四朝画家小传，多录清朝宗室和满洲画家。洪业据原燕大图书馆藏乾隆晚期抄本《画人备考》辑录校注，此书另有晚清陈焯辑本（收入《文艺丛刊甲集》，（上海）商务印书馆，民国四年铅印本，民国六年再版）。

素苦□（沮）洳，砥□（砺）□（安）澜，公与有力，至今故老有能言其事者”<sup>①</sup>。墓表中虽未明言董殿邦于何年扈从康熙帝南巡，与哪位河臣探讨治河事宜，但结合前文所引上谕的记述，可以断定董殿邦是在康熙三十八年扈从康熙帝第三次南巡，而且是在康熙三十八年三月至七月三日间与时任河道总督于成龙探讨“修防蓄泄之要”，并图写“全河形势”。另外，董氏与高氏均有多人担任内务府要职，堪称内务府世家，而且两大家族有联姻关系，如董殿邦次女嫁雍乾年间的江南河道总督高斌之侄高泰为妻<sup>②</sup>。因此，董殿邦应该与高斌相熟，并可能一贯关注和了解河务，所以才能“动中机宜”。

张鹏翮《治河全书》中所载的康熙上谕反映了清代康熙年间黄河图的绘制和流传机制：康熙帝委派内务府擅长绘画的官员前往河院了解河情、绘制河图，并带回京师进呈御览。康熙帝通过河图了解河务及河督的治河进展，并以河图向河督指授方略。可以说，黄河图在清代康熙朝的河政运作中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

除了在河道总督和康熙帝之间呈奏、流转外，于成龙绘进的河图在康熙帝和中央官员进行河政决策的过程中也得到了充分运用。《清圣祖实录》卷一九五载：

（康熙三十八年）九月戊申，上以于成龙所绘河图示大学士等，谕曰：“今四海太平，最重者治河一事。朕前巡视，知水之不治，由洪泽湖水势甚大，既不能泄，又加黄、运两河合并，势愈浩瀚，以致泛滥。……朕意惟有导河稍北，使彼不得侵入清水，而疏泄洪泽湖，使之下流，全用清水以刷沙淤，如此则水自无不治矣。今岁南巡，见黄河逼近清口，黄水倒灌，以致淤垫。洪泽湖水不出，自高家堰减水坝流入高、宝诸湖，自高、宝诸湖流入运河，以致下河田地尽被淹没。……近差工部官员往看，清口仍然淤垫，洪泽湖水仍未出口，堤岸尚未告竣。清口甚为紧要，如不将清口挑浚，湖水不出高家堰，并运河堤工，虽加高厚，均属无益。尔等会同九卿、詹事、科道，详阅河图，速议具奏”。<sup>③</sup>

据此可知，康熙三十八年九月戊申，康熙帝

以于成龙所绘河图谕示大学士，指出黄河水患的根源是清水无法畅出清口，致使黄河倒灌，清口淤垫；洪泽湖水不能从清口泄水，唯有自高家堰减水坝流入高、宝诸湖，又自高、宝诸湖流入里运河，漫过运河东堤后，再泄入下河地区，致使下河田地坟庐尽被淹没。因此，解决下河水患的关键是疏浚清口，使洪泽湖水能畅出清口、刷黄冲沙。

康熙帝和大学士及九卿、詹事、科道所研读谈论的河图应该就是康熙三十八年三月庚午，康熙帝命于成龙将清口应修之处绘制呈览之图。在此，河图成为河道总督于成龙和康熙帝之间、康熙帝和大学士之间、大学士和九卿、詹事、科道之间沟通河情的桥梁，是康熙中期清廷进行河政决策机制和河务运作的重要纽带。

根据《董殿邦墓表》和康熙帝上谕记载，董殿邦是在康熙三十八年二、三月间扈从康熙帝南巡时“奉旨图写全河形势”，也就是绘制“黄河全图”的。而于成龙在三月奉命绘制之图则重在表现“清口应修之处”，两者的涵盖范围和表现重点有所不同。根据康熙帝阅图后的描述和指示，康熙三十八年七月董殿邦带回清宫之图和康熙三十八年九月清廷研读之于成龙河图，描绘重点都应该是清口洪泽湖地区和下河地区，而不是黄河全图。因此，董殿邦所绘之“全河形势图”是否就是他三十八年七月初三带回给康熙帝御览之图，康熙帝与大学士在康熙三十八年九月进行研讨所据之于成龙河图是否就是三十八年七月初

<sup>①</sup>[清]陈大复：《光禄寺少卿内务府总管董殿邦墓表》，载《北京图书馆藏中国历代石刻拓本汇编》，（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0年，第76册，第195页。董殿邦墓在今北京房山区良乡南坊镇董氏祖茔，其拓片纵215厘米，宽77厘米，满汉合璧。董殿邦生平事迹另参清雍正鄂尔泰等纂修，李洵、赵德贵点校，《八旗通志》卷4《旗分志四·正黄旗满洲佐领》，（长春）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85年，第67页。

<sup>②</sup>刘小萌：《关于清代内务府世家》，载《明清史论丛——孙文良先生诞辰七十周年纪念文集》，（沈阳）辽宁大学出版社，2004年，另刊载中华文史网：<http://www.historychina.net/cns/QSYJ/ZTYJ/ZZS/03/20/2006/16400.html>，2009-6-15。

<sup>③</sup>《清圣祖实录》卷195“康熙三十八年九月戊申”条，《清实录》第五册，第1058页。《圣祖仁皇帝圣训》卷33《治河一》“康熙三十八年九月戊申”条记载相同。

三董殿邦带回之图均无法断定。换言之，上述文献中共记载过三幅黄河图：分别是墓表中所载董殿邦于康熙三十八年二、三月间扈从康熙南巡时所绘之“全河形势图”、董殿邦于康熙三十八年七月从河院带回进呈康熙帝御览之黄河图、康熙帝与群臣于康熙三十八年九月所阅读研讨之于成龙河图，三者之间究竟有怎样的关系，是否为同一幅舆图，或是其中的两幅实为同一幅舆图，凡此种种，目前仍难于断言。可以断定的是，三图均为康熙三十八年三月庚午之后应康熙帝要求绘制、重在表现康熙帝南巡治河之功，着重描绘清口、下河地区河势与水利工程的黄河图。

今台北故宫博物院所藏《江南黄河图》重点描绘的正是洪泽湖水不能从清口畅出泄水刷黄，一则使黄河倒灌、淤垫清口，再则自高家堰减水坝流入高、宝诸湖，又自高、宝诸湖流入里运河，泄入下河地区的河势情形，与康熙帝所述于成龙之河图甚为切合。因此，《江南黄河图》很有可能就是于成龙于康熙三十八年三月至九月间绘呈康熙帝御览之黄河图。

在与大臣详细研读于成龙绘呈的河图后，康熙帝认为平面河图难以反映地势高下、河道高低，准确描绘河势，于是他便运用康熙二十九年（1690）以来从任职清廷的法国耶稣会士白晋（Joachim Bouvet, 1656—1730）、张诚（Jean Francois Gerbillon, 1654—1707）等人那里所学的立体几何知识<sup>①</sup>，亲自改制木刻的立体清口河图，以便明了河势、治理河患。《清圣祖实录》卷一九六载：

（康熙三十八年十一月）丁未，（上）谕大学士等曰：“河图绘于纸上，平漫难辨高下。朕欲改清口，刻木制成一图，观看易明。着侍郎常绶前往河工，会同于成龙，清口应否改移，详加看阅，岁内着速回具奏”。<sup>②</sup>

（康熙三十八年十二月）辛巳，奉差查勘河工、工部侍郎常绶等回奏。上曰：“尔等带去改移清口河图，伊等云何？”常绶奏曰：“于成龙等云，遵上旨改移清口，则清水自是易出；但水泛时，两边堤岸倘致冲决，保护为难。将高家堰减水坝堵塞，加帮修筑，似有裨益。”<sup>③</sup>康熙帝亲制立体木刻“改移清口河图”，并派工部侍郎常

绶携图前往河院，勘验河工，并传谕河督于成龙依木刻立体图改移清口。于成龙回奏，改移清口容易导致堤岸冲决；堵塞高家堰减水坝，加高堤防，抬高洪泽湖水位，逼洪泽湖水出清口刷黄，更为可行。收到于成龙回复后，康熙帝向群臣陈明相关利害，让大学士与九卿讨论清口治理方案。如果说于成龙绘进河图是汇报河情、陈述政见的工具，那么康熙帝亲制、并派人下赐于成龙的木刻立体“改移清口河图”，则是康熙帝指授治河方略的工具。

《江南黄河图》原藏清内阁大库，说明此图应该是随于成龙的题本奏疏一并上奏康熙帝御览的。今检清康熙年间的内务府造办处舆图房的藏图目录《天下舆图总折》之中，著录为康熙三十八年前后的河渠水利图有：“康熙三十八年二月初二日，奉旨交来《旧黄河图》一张、《黄河绢图》一张、《黄河图》一张、《通州河图》一张、《洪泽湖图》三张、《永定河图》一张、《通州永定河合画图》一张。”<sup>④</sup>这些“奉旨交来”的河图主要是黄河图、江南洪泽湖图和直隶通州永定河图，绘制时间呈送在康熙三十七、八年间。而在这段时间，于成龙先担任直隶巡抚修永清、固

<sup>①</sup>康熙帝一贯重视西方科技，聘任耶稣会士担任宫廷教师，亲自学习西方科学知识，尤其是欧洲天文学、地图学和数学。详参潘吉星：《康熙帝与西洋科学》，《自然科学史研究》1984年第2期，第177—188页。康熙曾命白晋、张诚等在法国招募多位法国耶稣会士来华主持测绘《皇舆全览图》，对清代政区图乃至欧洲国家的疆域政区图测绘都产生重要影响，对此中外学者自二十世纪初就有许多研究，兹不赘述。

就数学知识而言，康熙曾先后向耶稣会传教士南怀仁（Ferdinand Verbiest, 1623—1688）、张诚、白晋等人学习《几何原本》（Elements），并亲自参与《几何原本》满汉文本的翻译编订，具有较好的数学基础尤其是立体几何知识，从而为其制作立体河图奠定了基础。详参康明昌：《〈几何原本〉四百年》，《数学传播》2008年第32卷，第16—29页。

<sup>②</sup>《清圣祖实录》卷196“康熙三十八年十一月丁未”条，《清实录》第五册，第1067页。《圣祖仁皇帝圣训》卷33《治河一》“康熙三十八年十一月丁未”条记载略同。

<sup>③</sup>《清圣祖实录》卷196“康熙三十八年十二月辛巳”，《清实录》第五册，第1070页。

<sup>④</sup>〔清〕内务府造办处舆图房：《天下舆图总折》，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馆藏内务府舆图房第一号档案。

安浑河堤并“绘图进呈”，康熙帝改浑河名为“永定河”；后又于康熙三十七年十一月起复任河道总督。从时间和制度推断，这些图很有可能都是于成龙绘制进呈的。不过，《天下輿图总折》中著录的几幅黄河图进呈时间均在康熙三十八年二月初二，正是康熙帝从京师出发开始第三次南巡之日，在康熙三十八年三月庚午康熙帝指示于成龙绘制清口河图之前。因此，上文所载康熙三十八年七月、九月康熙帝两次所示的河图，应该是于成龙在康熙三十八年三月后绘制，董殿邦于七月初三带呈康熙的新图，而不是康熙三十八年二月初二入藏内务府造办处輿图房之旧图。

### 三 于成龙《江南黄河图》之价值

台北故宫所藏《江南黄河图》，绘制时间介于靳辅《黄河图》和张鹏翮《黄河全图》之间，反映了康熙前中期知名河道总督靳辅和康熙朝中后期知名河督张鹏翮之间，董安国、于成龙两任河道总督治河的史迹，突出描绘了康熙三十五至康熙三十八年间黄河尾间、里运河和下河地区的河势情形。于成龙于康熙三十八年三月庚午之后受康熙帝之命绘制、由董殿邦带呈给康熙帝御览的河图，是河道总督于成龙和康熙帝之间、康熙帝和大学士之间、大学士和九卿、詹事、科道之间沟通河务的桥梁，是康熙中期清廷进行河政决策的重要依据。康熙帝委派擅长绘画的内务府官员董殿邦前往河院了解河情、督促河督绘制河

图，通过河图了解河务及河督治河进展，又以自创的木刻立体“改移清口图”向河督指授方略。可以说，河图在清代河务决策和河政运作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康熙中期于成龙担任河道总督治河期间，康熙帝、河臣于成龙、内臣董殿邦都主持绘制过黄河图，其中既有河督于成龙绘呈、重点描绘清口、下河地区的“江南黄河图”，又有河臣董殿邦所绘表现黄河全程的“全河形势图”，更有康熙帝别出心裁创制的木刻“改移清口图”，充分反映了清代黄河图类型和来源的多样性。如台北故宫藏《江南黄河图》确系于成龙在康熙三十八年七月前后所绘，那么此图正反映了于成龙治河的历史与清康熙中期的河图绘制机制和河政运作方式，在清代河政史、水利史和地图史上都具有重要价值。

《江南黄河图》的覆盖范围仅限于江南一省，与靳辅和张鹏翮所绘河图多表现河道总督所辖全境河道或黄河全程不同，开创了清代分段黄河图或分省黄河图的先河。此图虽然不及靳辅《黄河图》那样精美绝伦，也没有像张鹏翮《黄河全图》般广泛流传，但却是清代康熙朝河渠水利图中的重要一环，在清代黄河图乃至河渠水利图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价值。

[附记] 感谢《中国历史地理论丛》期刊审稿专家所提宝贵意见。

## Hydraulic Map, Flood and Watercourse Governance official “Map of the Yellow River in Jiangnan Province” of Yu Chenglong and the Watercourse Governance Politics of Middle Kangxi Reign

Xi Huidong

(Research Institute for History of Northwest China, Northwest University, Xi'an, 710069)

**Abstract:** The hydraulic maps had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flood management and watercourse-governing politics of Qing Dynasty. The “Map of the Yellow River in Jiangnan Province”, preserved in the Taipei Palace Museum in succession, was painted in the 38th year of Kangxi Reign (1699) by Yu Chenglong the Watercourse Viceroy under the order of Emperor Kangxi personally. For solving the problems led by the river-obstructing dams built by the former Watercourse Viceroy Dong An-guo, Emperor Kangxi made his third inspection tour to the South in the March of the 38th year of Kangxi Reign when Emperor Kangxi ordered Yu Cheng-long and the official of the Imperial Household Affairs Office Dong Dian-bang to paint maps of the Yellow River, and then he created the

wood Map of Qingkou. Those maps were all fully used in the watercourse-governing operations during the middle Kangxi Reign. Being the communicating bridge about the watercourse situation between the Watercourse Viceroy and Emperor Kangxi, Emperor Kangxi and the Great Scholars, the Great Scholars and the Nine Ministers and so on, the Map of the Yellow River in Jiangnan Province was important foundation of watercourse administration in the Qing Dynasty. The map tells the third inspection tour to the South of Emperor Kangxi, the mapping system and the circulating ways of the hydraulic maps of the Qing Dynasty, and thus takes an important position in the watercourse administrating history, the hydraulic history and the cartographic history of China.

**Key words:** Map of the Yellow River in Jiangnan Province; Watercourse Governance Politics; Emperor Kangxi; Yu Cheng-long; Dong Dian-bang

---

## 《中国古都研究》征稿启事

《中国古都研究》创刊于 1983 年,是由中国古都学会主办的大型学术刊物。本刊以推进中国古都学研究为宗旨,致力于刊发古都历史研究和古都文化现代传承等方面的学术论文,读者对象主要为国内外各高等院校、科研机构、文化团体与城市规划建设部门的专家、学者及管理人员。

为全面展示古都研究最新成果,推动古都研究,本刊向国内外古都学研究的专家学者发出征稿邀请,热忱欢迎各位方家不吝赐稿。

### 优先刊发

1. 本刊优先刊发古都学研究最新成果,优先刊发反映国内外古都学相关研究前沿、最新成果及古都建设动态的研究论文;

2. 文稿如系课题研究成果,请注明基金项目名称及编号,本刊将优先刊用;

3. 本刊对高质量稿件,采取优稿优酬的原则支付稿酬和图片费用。

### 稿件要求

1. 来稿需符合学术规范,观点鲜明,论证缜密,材料翔实,语言精练,注引严谨,篇幅一般在 8000 字以内,重大选题以不超过 15000 字为宜;

2. 稿件一般包括题名、作者及工作单位、所在省份和城市、邮编、中文摘要(200—300 字)、关键词(3—5 个)、英文摘要、正文(学术性论文应加注释)。引文请使用页下注,认真核对并注明出处。

### 投稿方式

1. 信函投稿,投稿地址:710062 陕西省西安市长安南路 199 号 陕西师范大学西北历史环境与经济社会发展研究院古都学会秘书处,来稿请注明《中国古都研究》投稿;

2. 电子邮件投稿,投稿邮箱:zhggdyj@126.com;

### 特别说明

1. 请勿一稿多投。投稿后 4 个月内未收到用稿通知,作者可自行处理;

2. 编辑部对刊用的文稿有权删改,重大删改当与作者协商,不愿删改者请在投稿中注明。

《中国古都研究》编辑部

2012 年 6 月 25 日